

读史阅世

厦门与波士顿的百年茶事

□江振鹏



因茶而兴的厦门鼓浪屿美国领事馆

1773年12月的波士顿倾茶事件被称为美国革命的开端。中国茶叶从何而来?是来自当时的广州港还是其他港口?以笔者目前所见,中国学界并未注意到这一细节问题。考诸史料,1925年上海出版的《中国评论周刊》(亦称《密勒士评论报》)英文杂志曾刊发《厦门茶叶开启美国革命》一文,其内容援引自美国国家地理协会的公报信息:“正是在世界主要茶港厦门,1773年于此出航船上装载的茶叶在数月之后引发了美国革命。”“甚少人知道的是,厦门港在美国革命历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起点

近代欧洲人消费的中国红茶主要来自武夷山脉为核心的福建茶区。追溯历史,英国东印度公司正是从厦门港运茶开启英国对华茶叶贸易的。

早在1644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就在厦门设立贸易办事处,主要目的就是运销福建武夷茶。1678年,英国东印度公司万丹总办事处甚至打算将厦门建成中国商馆总部。1681年,伦敦总部派出4艘商船,装载银圆、绒布、铅等货品来厦门交易茶叶等物资。康熙平定台湾之后,清廷放宽沿海港口贸易限制,1685年厦门重新开放。至1704年,有记载的英国东印度公司商船频繁访问厦门,运输茶、瓷器等商品。厦门、宁波、广州等“番舶交易之区”,不时有东印度公司船只往返其间,这一局面持续到1730年。

1757年(清乾隆二十二年)清廷颁令,只允许欧洲商人在广州一口进行贸易。为了有效收取关税,减少国内官商通商之患,清政府严格命令福建、安徽茶区的商贩不得通过沿海福州、厦门港与外商直接贸易,而是要通过内陆商路各关卡转运至广州港,再由广州十三行商人与欧洲人进行贸易往来。然而,广州体制繁荣的背后弊端尽显,如范岱克在《广州贸易》一书中指出,沿海“走私日益猖獗”。显然,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船只并未遵循清政府只限广州一口贸易的命令,而是将船只直接开到厦门等港,实质就是从事走私贸易。

正是由于非官方允定贸易的性质,英国东印度公司对来自厦门运茶的船只记载语焉不详。美国史学家马士的《英国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是记录早期中英茶叶贸易最重要的参考史料,但其在第一卷中对广州茶叶输出与美国革命爆发之间关系记载并不明确,马士本人就说1754年至1774年这21年间的记录是“缺憾”。

考虑到厦门本身就是福建南部茶叶贸易集散中心,当地种茶制茶素有传统,茶叶贸易活跃,直抵厦门运茶能够带来更大利润。武夷山场制茶僧侣大都来自晋江,星村茶市执事也是“漳泉亦间有之”。闽南商人是近代贩卖武夷茶的重要中间媒介。粤港通商之后,番舶往来,武夷茶销路大开,茶区延及漳、泉。沿海走私之众难以杜绝,否则清廷也不愿屡次下令禁止茶区直通海运。再者,中国沿海厦门与广州之间经济、人员往来密切。闽南籍商人如安海移民伍秉鉴家族、同安潘振承家族本身就任在十三行担任行商,他们对广州体制下沟通中外茶叶贸易的纽带作用不容忽视。因此,1773年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船只直接从厦门港运走茶叶也就不难理解。

由此看来,与波士顿抗茶会、美国革命直

接关联的中国茶港不是广州,而是厦门。罗伯特·莫尔在《中国沿海城市:厦门》一文中将福建厦门港作为美国革命的重要一环:“那些被著名的波士顿抗茶会倾覆的茶叶就是装载于英国船只之上、由厦门启航的。”

1789年,雅布斯·鲍文在与美国首任副总统约翰·亚当斯通信中,谈及波士顿武夷茶因茶税降低而价格下降的情况,当地消费者更容易接受。后世亚当斯文件的编者特意将武夷茶标注为一种“来自中国的红茶和乌龙茶(Oolong)”。美国茶商和消费者所讲的乌龙茶主要就来自厦门港,现代意义的乌龙茶是指半发酵的茶类,与全发酵的红茶有所区别,但早期外国消费者和茶商仅根据乌龙与绿茶相区别的汤色,将其视为福建红茶(武夷茶)大类中的一个品种。总体说来,乌龙茶进入市场尤受美国消费者的青睐。

兴盛

美国独立战争和1812年第二次英美战争实际上迫使英帝国改变殖民贸易体系。一方面,英国稳定从南美地区获取白银能力下降,英国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中白银供给难以维系,英国转而对华输入印度种植的鸦片,鸦片代替棉布成为英国输华大宗商品。另一方面,美国独立反过来促使英国加强对亚洲殖民地的控制掠夺,英国贩卖发动鸦片战争的罪恶及其咄咄逼人的野心,引发清廷警惕。

1813年,清廷再次颁令禁止福建山区茶叶从海路直接贩运。林则徐在广州领导禁烟运动,打击了英国鸦片商人的直接利益。1839年英国悍然发动鸦片战争,强行开辟五口通商。1844年,美国则趁机会通过《望厦条约》在福州、厦门建立领事馆,更加接近福建茶区。

1853年,波士顿商号旗昌洋行利用太平天国起义、上海小刀会起义阻断东南商路之际,从福州溯闽江而上,直抵武夷茶区。这不仅直接开辟美国茶商与中国茶区运输通道,也打破英商对福建优质茶源的主导格局。清政府允许茶叶从福州出口,福州港外销茶猛增,厦门也

利用航运便利和毗邻茶区的优势,发展外销茶业务。波士顿商人还出资创新运茶快帆船,与伦敦商人则在福州、厦门等茶港展开运茶竞赛。连接福建茶区与贸易中转港福州、厦门和香港等城市之间的海运航线更加绵密。

19世纪60年代,厦门港出口大宗商品为茶叶和冰糖,其中红茶是最有价值、最重要的商品。从厦门港出口茶叶主要品种是工夫茶、乌龙茶、小种和安溪茶。来自波士顿的美商旗昌洋行、琼记洋行等纷纷在厦设立机构,运销茶叶。1864年出口茶叶达53236担(1担等于50公斤)。1865年起,外籍税务司控制厦门海关,美国内战结束后经济快速成长,美国消费市场对中国茶叶需求猛增,由此推动福州和厦门作为世界茶港的崛起。

1866年,厦门港出口纽约的茶叶达到600万磅。据统计,1863—1867年间,厦门出口美国的茶叶是同期出口英国的5倍多。美国市场感兴趣的台湾府茶叶也从厦门港整装出发。1870年台湾输入厦门港乌龙茶为5065担。闽西南与台湾茶叶皆汇集在厦门港出口,厦门港成为福建南部茶区、跨越海峡台茶的集散地。

茶叶成为外国商人到厦门港最感兴趣的贸易商品。仅1874年,美国商人从厦门港运出的茶叶就达750万磅,这时厦门港出口茶叶几乎全部运往美国。1879年,厦门港(含台湾)茶叶出口在中国各茶港中排名第四。1881年,厦门直接出口美国茶叶为45309.86担,台湾府茶经厦门复出口美国79435.45担。

纽带

1889年,随着美国对中国茶叶质量的日趋提升,连美国领事都向中外茶商通报厦门乌龙茶之“质量问题”,1890年厦门茶叶出口美国仅剩16500担。

1895年日本强割台湾后,基隆港外销茶被强行剥离于中国经济网络之外,台茶外销利润

大都为殖民当局和日商所夺,台茶输美也以乌龙茶为主形成竞争,厦门茶港地位急剧下降。

1897年美国出台《掺杂与不卫生茶禁止条例》,纽约等地设置茶师检验到港茶叶,质量低下或掺杂者皆要被退货,这一法案对厦门港茶叶出口构成严重影响,茶路受阻。1899年美国运茶船最后从厦门运走3.1万磅茶叶,自此之后美国运茶船不再抵厦,整个厦门港茶叶输出暂时凋零。1901年厦门海关报告就指出“本港作为茶港已经消亡”。

清政府严厉禁止鸦片直接导致英帝国原有贸易体系瓦解,为了攫取中国茶叶利润,英国植物学家、贸易商和殖民官员不断刺探中国种茶制茶秘密,采取包括直接偷窃茶种、雇佣华人制茶师傅等措施。最终英国在印度开始自主种植茶叶,殖民地茶商通过印度、锡兰种植园建立现代茶产业。1882年,英国还在军事上控制苏伊士运河,大量运用蒸汽船,南亚茶叶往欧洲运输成本降低。英国不再大规模从中国购买茶叶,有购买要么是拼配中国茶与印度茶,提升印度茶品质口感,要么是满足小众奢侈需求。

更为关键的是,英属印度茶叶公司逐渐建构起营销网络,直接面向世界最大茶叶消费市场美国,印度茶和锡兰茶逐渐替代中国茶叶在美国红茶市场上的地位,而中国在美国绿茶市场又受到日本绿茶的挤压,福建福州、厦门在国际茶叶出口中的地位难以维系,而美国茶港重心则从波士顿转向交通更为便利、市场更为庞大的纽约。不过,波士顿茶商、贸易公司凭借长期的经验、资本和航运优势,在纽约茶港贸易中依然起着重要作用。

美国东北部的贸易商发展出以美洲白银、人参、皮毛甚至土耳其鸦片来交换中国茶叶、瓷器和丝绸等的贸易结构,这不仅促进了美国早期的经济自立,也让美国工业化拥有一笔所谓的“老钱”资本。茶商、茶企和贸易商聚集的波士顿形成了“波士顿企业圈”,当地众多公司和商人业务彼此联系,拥有雄厚的经济根基、复杂交织的联系网络和立足全球的国际视野,这是一群被称为波士顿“婆罗门”式精英阶层,他们热衷推动博物馆收藏亚洲艺术、资助大学教育和公益事业等,波士顿成为文化教育和艺术之城,对美国产生重要影响。

大航海时代以来,商品流动、远距离贸易和信息交流成为经济全球化深度发展的直接体现。1954年9月,美国《华盛顿邮报》再次援引美国国家地理协会的说法,强调“1773年波士顿抗茶会造成了厦门茶叶的麻烦”“具有历史意义的英国运茶船正是从厦门出发的”。茶叶这一纽带牵引西太平洋沿岸厦门与大西洋沿岸波士顿这两座口岸城市之间发生密切联系,上演了亚洲与美洲两座城之间跨度长达126年的因缘际会。双边的联系网络也由此发生“蝴蝶效应”——

广州体制时代,英国东印度公司从厦门运出的福建茶叶无意间开启美国革命进程。鸦片战争后,波士顿商人开拓的茶叶网络带动厦门茶港发展,销往美国市场的茶叶最多,带动厦门市区航运、交通和洋行的富集。景气时期,厦门茶叶外销无论对闽西南经济腹地茶区的扩大,还是对美国、澳大利亚茶叶市场的拓展,抑或对中国洋侨销茶体系方面都作出了贡献。

(作者单位: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

说史谈屑

福州漆器“茶食雅集”

□姚凯

漆艺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珍贵遗产,其历史可追溯至远古时期,在黄河与长江流域已有广泛传播,从春秋、战国至汉代的古墓中发掘出的众多精美漆器中得到证实。福州气候温润,适宜漆器制作,加之其作为内外商品集散地的地理优势,使得当地漆器工艺迅速发展。《重编日用百科全书》(商务印书馆编,1934年出版)指出:“漆器为中国著名艺术品之一。现今所产,以福州为最佳。”

清朝时,以沈绍安漆器店为代表的福州漆器已名扬海外。民国时,以李芝卿为代表的福州漆艺家将日本“变涂”技法融入福州传统漆艺之中,为后世留存了百余块漆艺装饰技法样板,对现今的福州漆艺仍影响深远。

我国的茶文化自汉代以后慢慢兴盛起来。从文献记载看,汉时王褒《僮约》已有“武都买茶杨氏担荷”语。茶乃南方之嘉木,漆亦为江南之特产。自明清时期起,武夷山茶叶便使福建

省成为全国的茶叶贸易枢纽,到了清初,武夷茶经福州港海运至西欧,其声誉达到巅峰。茶叶贸易的兴盛带动了福州漆器行业的发展,从而大量生产与茶叶相关的包装产品。福州特有的漆制茶箱应运而生,由沈绍安正记的漆茶叶箱在1900年法国巴黎世博会上获得了金奖。

中国茶器的发展历史悠久,种类繁多。从功能上,有茶具、煮具、贮具等;从性能上,又可以分为日常茶具和工艺茶具。相较于传统的陶瓷、石陶或竹制茶盘,漆艺茶盘因其便携、耐用及特殊的耐热、耐酸碱、不掉漆性质而显得尤为突出。《本草纲目》载,漆气味辛、温,有消肿杀虫、活血散瘀之功效。作为供饮食用的漆器茶具,在很长的历史发展时期,一直未曾形成规模生产,直到清代由福州制作的漆器茶具才逐渐引起了人们的注目。

漆器茶具的制作工艺精湛,主要以采集自天然漆树的树脂为原料,通过炼制天然漆液

并融入不同的自然矿料,制成色彩绚丽的器。这一过程包括制胎、涂漆、描绘等多道精细工序,展现出卓越的技艺。福州生产的漆器茶具造型和装饰款式琳琅满目,有“描金”“彩漆”“赤宝砂”“绿宝砂”“罩金”“抄漆”“釉变金丝”“台花”工艺等,使得这些茶具更加技艺超群,深受当时人们喜爱,为使用者带来了新的乐趣。

成套的茶具通常包括以下组件:一个托盘、一把茶壶(或一大小各一的茶壶组合)、五组以上的茶杯与茶盏,以及茶匙、茶针、茶夹各一件。沈绍安兰记《朱漆描金彩绘牧牛图盘》,其制作的朱漆彩绘牧童戏牛图茶具,描绘了牧童在柳树下与牛群嬉戏的场景,画面布局简洁,刻画细腻,苍劲的松枝、稳重的水牛、纯真的牧童和随风而动的野草,构成一幅和谐统一的图画。动静结合,对比鲜明而又相得益彰,呈现出完美的视觉效果。

一种器型的演变与器物功能紧密相连,主要是取决于人们的生产、生活需要,意识形态方面的影响也是不可忽视的因素。福州漆器茶具在图式上通常有几种风格,一种常见的主题是围绕日常生活的画面,其图案设计繁复且细节丰富,呈现一种视觉上的饱满感,这些场景通常包括人物在山水中的休闲活动、河畔凉亭中的社交聚会,以及远处山脉和丘陵的宁静远景。更多的主题是表达目的和愿望的图式语言,描绘奇花异草、珍禽、灵兽之类图案,描绘纹样、牡丹花、莲花、丹顶鹤等,取“平安”“富贵”“连子”“延年益寿”之意。

在材料工艺与色彩方面,早期的福州漆器茶具多采用木胎或脱胎,其上用夏布或绸料以漆裱上,再连上几道漆灰料,并经过糙漆、打磨和髹饰等精细的工序制作而成。这些初期产品通常颜色较为单一,以黑色、黄棕和

深绿色为主,多用以夏布裱粘猪血灰做底并髹涂黑色而成,其合当时民间需要。最初的设计强调实用性,髹饰的工艺和装饰鲜少看到,且能耐高温、耐酸碱腐蚀,适合日常使用。

近代福建漆器生产销售的茶具用品有茶叶漆罐、漆茶盏、漆茶洗、漆茶托、漆茶盘、漆盒等,同时进一步细化了装饰艺术,形态上更为优美细致,特别是沈绍安家族生产的漆茶具或漆茶摆件,尤其注重将实用的器物注入美学原则,追求造型美观多样,一丝不苟,做工精细,选材精良,以其轻盈、小巧、流畅而受到赞誉,且部分漆器茶具采用了“薄料彩髹”技法,使仿古漆的颜色从原来的厚重色转变为清丽明快的淡色,丰富了漆器茶具的装饰彩绘手段,推动了漆器从实用性向艺术性的转变,现代漆器茶具还结合了不同材料和工艺,如金属、陶瓷等,形成了多元化的风格。

福州漆器茶具在历史进程中几经兴衰,都伴有众多默默无闻的能工巧匠书写着“工匠精神”,他们不仅传承着古老的技艺,更在创新中不断探索,将福州漆器工艺推向新的高度。从最初简单使用需求到注重文化传承和艺术表现,不仅继承前人的智慧和技艺,更在其中融入了自己的理解和感悟,赋予福州漆器茶具时代的内涵和意义。

这也是我们当下福州漆器茶具行业的漆艺师们共同的研究课题:既要通过器物来传达生活美学和艺术情趣,让每一件作品都如同一首优美的诗歌,唤起人们内心深处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同时运用精湛的技艺和独特的创意,将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审美完美结合,为大众呈现出一幅幅富有诗意和时间沉淀的画面。

(作者单位:福建师范大学美术学院)

乡土琐记



福州上下杭张真君祖殿 卢鑫摄

张圣君食物传说与古代福建农业信仰

□黄艺娜 吴纪宁

张圣君信仰在闽台地区广为流传,他是海峡两岸民间最重要的道教信仰人物之一,传说其乳名慈恩,生于福建永泰山谷,活跃于北宋时期,早期形象是一个颇识法术、济世利民的游方道士,在唐宋造神运动中被福建民众推举为神,神号有张公圣君、张真君、张公真君、张公法主、法主公、都天圣君、都天法主、监雷御史等。

张圣君信仰历经800余年,各地自成特色,主要有莆田的张公信仰,以闽清金沙堂为中心的闽东张圣君信仰和以德化石壶寺为中心的闽南法主公信仰。进入明清,张圣君信仰在传说和民俗方面体现出农业神信仰的实质,留下许多关于食物的传说,包括放生红泥鳅、草药治病等,或可折射出古代福建农业发展的史影。

传说张圣君为度化闽清金沙镇金坑的严员外,前往严家当佣工,身体力行劝其禁杀生,戒口欲。一次,张圣君下田犁地时,严员外知其平常素食,不茹腥膻,却故意让丫鬟在煮粉干的底下藏了几条红糟泥鳅送给他吃。张圣君知其用意,吃完粉干后,便用筷子将红糟泥鳅一条条夹起放进田里,口中念念有词,那煮熟的红糟泥鳅竟一条条复活游走。

自此以后,梧桐村一带出现一种特殊的红泥鳅,其腹部还有两个凹痕,传说是张圣君用筷子夹过的痕迹。这些红泥鳅繁殖至今,成为当地的特有之物。

从农业的角度来说,在稻田中散养泥鳅对水稻的种植是有益的。泥鳅是一种底栖鱼类,通常生活在稻田和其他水域的底部,对水稻的生长并没有不利影响,反而有一些益处。泥鳅在淤泥中活动时,可以帮助改善土壤结构,使土壤更加松软,有利于水稻的生长。泥鳅的排泄物也可以作为肥料,为水稻提供营养。泥鳅是一种杂食性动物,它们的食谱包括水生植物、浮游生物、小型节肢动物、摇蚊幼虫和水生昆虫等。因此,泥鳅可以帮助控制稻田中这些害虫的数量,减少对水稻的损害。另外,泥鳅在稻田中还可以起到净化水质的作用,可以吸收水中的氨氮等有害物质,有助于维持稻田水质的平衡。

据传说记载,南宋淳熙三年(1176年),安溪县的民众普遍出现红斑症状,由于找不到有效的药物,疫情的发展十分危急。张圣君观察病情后发现,只有天山雪莲才能救民于水火之中。然而,天山遥不可及。于是,他决定先缓解民众的病痛,指示民众用瓜菜叶、生豆腐和香黄三味材料捣碎后涂于患处。

在古代,许多药品都是从植物中提取的,而农业生产提供了大量的植物资源。人们通过深入了解植物的生长情况、特性以及其季节性变化,逐渐掌握一套利用植物治疗疾病的方法。这种对植物特性的了解和掌握,也是农业生产的一个重要方面。

张圣君使用的治疗方法,反映出在当时,农业知识包括植物和草药的药用价值已经在民间得到一定的普及和应用。从现代医学的角度而言,瓜菜叶富含维生素和矿物质,有助于增强免疫力,促进新陈代谢,还具有降低血压、降低胆固醇、抗氧化等功效;生豆腐含有丰富的优质蛋白质、钙、磷、铁等营养物质,还含有一种叫作“大豆异黄酮”的物质,有助于调节身体的激素水平;香黄是一种传统的中药材,具有抗菌、抗炎、抗氧化等功效,常用于治疗感冒、咳嗽、支气管炎等疾病,同时具有抗肿瘤、抗疲劳、降血压等作用。

传说淳熙四年(1177年)的冬天,天气异常寒冷,尤溪山区更是如此。有一个农妇正在生孩子,由于家里贫穷,身体又虚弱,无法抵御这种严寒天气,情况十分危急。张圣君听说后,心生怜悯,将一些材料酿制成一缸红酒,送给这个农妇作为月子酒,还告诉农妇多吃一些糟菜,因为糟菜中含有铁质,可以补血。农妇按照张圣君的建议,结果她和孩子都变得健壮起来。这个消息很快就在邻里之间传开了。于是,在尤溪、德化、大田等县,许多即将生产的产妇都会酿制红酒备用,同时也吃一些糟菜来补血。这个传统一直延续至今,成为当地的一种习俗。这个传说反映信仰和农业之间的相互影响。在古代,农业不仅是人们的生活来源,也是信仰和宗教的重要基础。

福建是一个多神信仰盛行的地方,人们崇拜着各式各样的神祇,从海神、山神到农神,无一不体现福建人民对自然的敬畏和对生活的美好期待。在这样的信仰氛围中,张圣君作为农业神祇的地位逐渐凸显,成为福建农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传说不仅是对古代福建农业信仰的生动映射,更是我们洞察与农业生产实践紧密相连的社会生活状态的重要途径,从而为理解和感知古代农业文明提供了宝贵的视角。

(作者单位:福建技术师范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武汉大学历史学院)



《朱漆描金彩绘牧牛图盘》茶具 (福州沈绍安兰记)